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60
28 June 1990

CHINESE

第五六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6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奥斯瓦尔多·德里维罗先生（秘鲁）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60次全体会议开始。

根据工作计划，今天的会议继续审议议程项目1和2，题为“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可以就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主题进行发言。

今天发言名单上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蒙古的代表。现在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巴查诺夫先生发言。

巴查诺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本届裁军谈判会议是在世界发展处于关键时刻举行的。这并非是信口开河，而是重要的事实。世界正经历着迅速的变革，可以把它称之为真正的革命。今天，一年内所发生的事件超过了过去数十年内所发生的事件，一个月取得的发展超越了过去数年内的发展。我们正亲眼目睹着城墙土崩瓦解、似乎不可动摇的对峙逐步消失、新的国家不断涌现、世界政治地图发生变化——与过去不一样，这一切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和平民主运动发展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仅发生在欧洲，而且在世界的其它地区，即在民主、自由、正义和平等的理想不断发展的地区，也在进行着这种变革，当然它们并非没有碰到困难，有时候是较为重大的困难。

苏联也在进行着深刻的变革。我们5年前开始的改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同时，改革也揭示了我们的社会在数十年里形成的根本矛盾，社会的所有结构，不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正经历着巨大的压力。显然不能对这些结构无动于衷，因为它们会阻碍社会革新的进程，破坏社会稳定和取得进展的基础。

我们在国内面临的复杂问题不会使我们与整个世界疏远。改革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克服自给自足心理，自我孤立和封闭，创造一个开放的社会。

世界上和我国正在发生的变革本质上是客观的，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没有人能阻挡这一进程或拖其后腿。然而任何变革也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努力寻求变革与稳定的最佳结合。稳定并不等于一成不变地沿袭旧的结构。必须让一切过时的东西进入垃圾堆，但其方法不应对新事物的出现造成损害。

从这个角度而言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和相互尊重，在政治领域，从消极的相互谅解过渡到积极的相互作用和结成务实的伙伴，以便在迅速变革的环境中保持生气勃勃的稳定。

稳定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当今世界仍然背着武器过剩的包袱，主要体现在庞大的核武库、化学武库和常规武库。我国也积累了大量武器。我们充分认识到由此而产生的责任。由于一系列国内原因和外交政策考虑，苏联与其他国家一样，甚至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加关注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的稳步发展。然而裁军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仅仅是建立一个安全、民主和文明的世界的途径，我们需要这样的世界并希望成为它的一部分。但是不进行裁军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和新的安全结构。

在整个战后年代，大幅度削弱军事力量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大有希望。我们已经取得了普遍的共识，战争的威胁已成历史，国家之间和国家集团之间在正常和文明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本质上崭新的世界的独一无二机会正在出现。维也纳和日内瓦谈判中出现的前景为逐步打破旧的安全模式铺平了道路，这种模式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其主要基础是军事对峙。我们的理解是西方谈判伙伴原则上是以同样的设想作为出发点的。

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但愿今年——我们能通过谈判成功地签署协定，削减苏联和美国50%的核力量以及消除华约和北约常规武库突然袭击的可能性，那将极大地改善欧洲大陆和整个世界的局势，对东西方关系产生多方面的建设性影响，并将标志战后对峙时代的结束。不言而喻，那时我们将可以说世界局势取得了不可逆转和根本的改善，裁军问题处于决定性的转折时刻，超乎寻常的军备开始为用于防御目的合理武装所代替。

维也纳会谈毫无疑问对欧洲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对维也纳的谈判状况进行评估，使我们有可能查明23个与会国是否能就一系列原则问题，包括从概念上对初步谅解的结构进行处理的问题，达成高度一致的协议。同时除了大量技术细节外，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实质性问题。我们感到关注的是在35国谈判中就新一代建

立信任措施，其中尤其包括海军和空军的活动，尚未达成协议，虽然有关这些谈判主题的其他内容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如此，维也纳会谈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我们希望是最后阶段。会谈的这一阶段尤其需要充分考虑集体利益和每个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如果在谈判的这一阶段以感情取代常理，问题将难以解决，缔结一项极其重要条约的工作将遭挫折或被无限期推迟。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维也纳会谈中有关人员、航空、主要类型的军备的定义、区域划分、核查和销毁程序等遗留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可能拖整个全欧洲进程的后腿，尤其是维也纳条约是今年底全欧首脑会议的关键议程项目之一。

今天情况日益明显：欧洲的政治局势发展极其迅速，它已开始超越裁军进程。

当然，德国问题是现在欧洲安全和稳定的核心。德国将成为统一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建立一个欧洲共同大家庭和统一的经济、环境、法律和人道的欧洲整体作出重大贡献，对此今天不会有任何人怀疑。此外，在这样的情况，德国的统一进程能够也应该成为一种刺激因素——新的统一的德国成为一种动力——推动欧洲的深刻和实质性变革，以共同安全、信任和睦邻友好的原则为基础组成欧洲。

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事实。如果欧洲一切照旧，那么统一的德国将不会纳入新欧洲的蓝图。在这样的情况，德国的统一会破坏过去数十年里所建立的力量均衡并使矛盾恶化。我认为孤立德国不可取，我们赞成共同努力，创造可靠的和平结构。

华沙条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该组织如果要在进一步发展和促进欧洲合作和安全结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就必须进行深刻的改革。华沙条约组织已开始对其所有领域，包括军事领域的活动进行根本的改革。我们已建议北约国家朝着同样的方向努力，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特恩贝里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一旦开始这一进程，我们就必须铭记不仅其方向重要，与之相伴随的变革的能动性和程度甚至更为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正期待北约组织伦敦会议作出决定。

在欧洲大陆和整个世界正形成一个新的共同安全结构，对核武器也必须采取新的态度。我们提出了无核武器世界的理想，对此我们仍坚信不疑。但我们认识到我

们生活的世界并不理想。在我们的安全制度中庞大的核武库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希望以一日之功消除它们是不现实的。核裁军仅仅是范围更广、分阶段的进程的一部分，涉及到大规模削减武力和常规军备并根据非进攻性防御原则对其结构进行调整以及建立机制，以确保透明度和监督，不仅保证通过这一进程的各个方面执行裁军，而且为国家间的关系创造和缓气氛。最后，这一进程还将涉及到整个东西方关系的急剧变革，在政治、经济、人道和环境领域里以提供安全保障，并在有关双边和多边协定中对此加以规定，来逐步取代以武力维持和平的文书。这种处理办法将需要我们逐步克服核威慑理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安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予以消除。

今天比任何时候更值得对该理论进行详细和公平的反省。一方面它充满了对付敌人的观念，和相互恫吓和相竞贮存核武器的思想。这一理论本身，或者说贯彻该理论的文书，充斥了互不信任、猜疑、敌视和对对方错误的常常是荒唐的认识，这一切都是在“冷战”时代形成的。另一方面，只要这些僵化的思想和概念不克服，威慑理论能给某些国家一种安全感。也许这是一种类似于麻醉品的错误感觉。但是如果要消除人们这种错误的安全感即使是想象中的安全感，而同时不给他们提供一种新的安全感，那将是错误之举。最后，必须承认我们有时感到内疚，把该理论过于简单化，无视它在一定历史范围内为维持和平确实发挥过有用作用的事实。简言之，我认为正如有人指出的，除非人类能认识到未来的世界比过去的世界更安全，否则不可能一下子就克服这种心理障碍，把核武器全消除掉。在目前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无核世界不能理解为简单的返回到核武器发展之前的充满问题、矛盾和威胁的世界。在这方面实现“最低威慑”水平在目前看来是通向无核世界的现实阶段。这有助于消除威慑理论最危险的内容，同时维持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已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它不仅包括苏美关于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的条约，也包括消除和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成就。

苏美华盛顿首脑会议主要成果之一是为最后达成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创造了条件。现在看来几乎没有人怀疑年底之前将签署这项条约。签署后，条约将在苏联和美国最高立法机构讨论。同时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已引起巨大关注，人们正对议定的条文进行仔细分析。实际上它已遭到批评。尽管对条约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现在几乎没有人怀疑它将成为军备控制史上和美苏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当然，苏美关系史上曾签订过军事和战略方面的重要双边协定。但是它们仅仅是在具体领域抑制军备竞赛和限制美苏军事竞争。事实是60年代是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迅速发展的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这些导弹所载总的弹头数目迅速增加，原因是安装了分导式多弹头装置。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临时协定（1972年）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79年）均未能阻止这一迅速增长，——当然这并不贬低这些协定的不容质疑的价值。

如果苏美达成限制和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那么在战略三元体系发展史上，将第一次停止所有三种武器稳步发展的趋势，并在7年内，削减核弹头战略运载工具（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的数目和核弹头的数目。这将标志着真正削减战略武器的进程开始，即大幅度地削减数百辆运载工具和数千个弹头。更重要的是削减的目的是使第一次打击的可能性更小。结果将是增加稳定和减少战争威胁。

应该指出随着裁减战略武器谈判的开始，苏联和美国军事方案发生了重大变化，削减有关军备的部署和推迟采用新的军备系统。新的军事计划数目也直线下降。条约草案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大力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现代化。例如，限制弹道导弹的总投掷重量及其所载弹头数目的极限；禁止新类型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新型弹道导弹发射器；禁止带有分导式多弹头的空中发射巡航导弹。还制定了许多其他限制和禁止条款。总的来说就其本身目的而言，条约草案解决了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现代化的问题。

虽然裁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并不直接限制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但是双方将分别向对方提出有关海上发射巡航导弹的政策单方面声明，在条约有效期内每年

就海上发射的巡航远程导弹的部署计划，即距离超过600公里的导弹，向对方提出单方面声明。这些声明在政治上将具有约束力。每年的声明将具体载明条约有效的年头，条件是所宣布的数目不得超过880个单位。条约规定的削减和限制将伴之以广泛的核查措施，包括进行以对等原则为基础的12种现场视察，使用国家的核查技术手段，禁止对它们进行干涉和允许使用遥测资料和就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数量、地点和技术特点定期交换资料。为了促进条约目的的实现，双方将成立遵守和视察联合委员会。

我们知道根据条约裁减后的双方战略军备结构与双方对战略稳定的看法可能不会完全相符。然而，我们认为这说明我们更有理由主张拟定中的条约一旦缔结，就立即开始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下一阶段的谈判。

苏联和美国在华盛顿首脑会议期间签署的特别联合声明中表示决心在条约签字后立即就举行有关核武器和外空武器和进一步加强战略稳定的会谈进行协商和尽早在确实可行的日期开始这些谈判，这一决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条约本身。实际上，只有在华盛顿首脑会议明确阐明两国为实现核裁军（为此条约规定了必要前提）采取进一步步骤的意向，而且在这种广泛的范围内才可能对条约进行公正和客观的评估。

根据关于核武器和外空武器和进一步提高战略稳定的未来谈判的联合声明，苏联和美国同意就进攻性战略武器和它与防御性战略武器之间的关系举行新的会谈。他们的目标是进一步减少爆发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通过进一步稳步削减两国的战略武库来确保战略稳定、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在新的谈判中，重点将放在消除第一次核打击的刺激因素、减少战略运载工具方面核弹头的集中和对生存可能性较高的系统给予优先。

在评估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未来条约的意义时，必须铭记如果没有这样的条约苏联和美国可以达到超过两倍于他们实际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可以大幅度增加载有空中发射的核和无核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数目。部署海上发射的

核巡航导弹的方案将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在这种大规模削减战略武器的范围内，战略稳定更容易受非战略核武器——陆基和海上发射的非战略核武器的影响。

维也纳正在谈判的条约将消除欧洲常规武装力量的不均衡和不对称，这将为比较大幅度地削减陆基战术核武器，使之达到“最低威慑”水平，创造现实的前景。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仍有待谈判决定。但是显然，一旦削减到这一水平，双方的能力应完全限于威慑作用，不应使另一方以为它可以用于第一次打击，包括用于挑起动用常规军队的敌对行动。我愿提醒出席本会议的各国尊敬的代表，在这方面我们也已经开始单方面采取行动。1989年500枚核弹头已从我们的盟国领土上撤走——166枚空投弹头、50枚炮射弹头和284枚导弹弹头。在过去两年里，我们没有通过更换或其他手段来更新战术核导弹。

苏联建议争取尽早在今年秋季开始战术核武器谈判，为了为谈判创造有利气氛，我们决定进一步削减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具体说：到今年底苏联将在中欧削减60枚战术导弹发射器，即比中导条约削减的弹导的距离更短的导弹。在苏联这些导弹包括“R-17”或“Scud-B”（300公里）、“Tochka”或“SS-21”（70公里）和“LUNA”或“FROG”（70公里）。此外，在中欧我们还将削减250多门核大炮。其中包括口径在152毫米及以上的重型大炮。最后，将从该地区撤出1500枚核弹头。其中包括将要削减的导弹的核弹头、核大炮炮弹和引力炸弹。然而，苏联单方面削减武力的努力并不仅仅限于中欧。到今年底苏联在欧洲将一共削减140枚战术导弹发射器和3,200门核大炮。

虽然我们相信这些措施将为即将举行的战术核武器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我们单方面采取这些步骤，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我们也注意到北约近几年作出的从欧洲大陆撤出战术核弹头的某些步骤，我们认为布什总统放弃Lance方案和取消进一步更新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大炮军火的决定具有积极意义。我们仍然倾向于就彻底消除短程导弹和所有其他类型的战术核武器，包括其核部件，作出决定。然而，如果北约国家目前对这一种彻底的解决办法还没准备好，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一个中

间阶段的可能性，即减少不对称现象，使之尽可能达到最低水平。

限制和削减海基核武器是一重要问题，与确保“最低核威慑”水平的任务直接有关。除非该问题得到解决，在核裁军其他领域的努力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很可能在核军备竞赛领域里再次加剧军事对抗，使未来的协定成为泡影。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了尊敬的瑞典代表、裁军委员会主席泰奥林大使、尊敬的芬兰代表、国家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卡尔赫洛和尊敬的阿根廷代表罗伯托·加西亚·莫里坦大使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作的内容全面的发言。

我们已经向美国提出建议，就分阶段削减和消除海基核武器（即不仅仅潜射弹道导弹）开始谈判；第一阶段可以处理消除水上舰艇的所有核武器问题。此外，会谈应该为远程核武装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问题拿出明确的解决办法，这种导弹也应予以消除。这当然能导致建立海上“最低核威慑”。

就陆基和海基战术核武器而言，“最低威慑”当然仅仅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只能把它看成是彻底消除这种武器的道路上的一个中间阶段。毕竟，最低威慑充其量同时意味着“核”临界，而从客观上来说，当把非战略核武器引进双方的核武库时，这种临界将变得更低。

关于核威慑理论，人们也许还记得它是在具体历史环境和具体区域范围内出现的。现在正在为该区域建立新条件奠定基础，这种新条件也应使所有人对核武器的作用采取新的看法。经过了40年的对峙、若干次危机（每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大量资源无法挽回的浪费和最后认识到需要新的质量基础上建立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核威慑理论或以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基础的威慑理论在世界其他地区抬头和变为事实，那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扩散核武器的威胁仍然存在，重要原因之一并非据说是苏联和美国在核裁军领域的努力还不够有效，而是世界各地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日益增长和非核武器高度集中。在这方面不扩散核武器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并与解决其他区域性裁军问题（特别是不扩散化学武器、导弹和导弹技术、限制军火贸易等）以及缓和存在潜在冲突

和危机的地区的紧张局势有关。苏联和美国在首脑会议通过了内容广泛的声明，载有双方在这些领域相互作用以及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具体途径。它说明双方共同承认必须加强加速裁减军备的进程，采取旨在反对在世界上扩散武器的措施。苏联和美国也为解决地区冲突作出重大努力。

就核裁军问题而言，我们的讲坛，即裁军谈判会议，迄今被排斥在外。在处理实际多边核裁军问题方面，裁军谈判会议无疑是进行谈判的场所。然而，三个核武器国家声称在未具备某些条件之前，它们不准备参加核裁军谈判。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进行概念性工作，例如在同样的非正式会议上。在这方面我要提请注意一个具体的核裁军问题，禁止生产武器用的裂变物质。实际上，这种禁止将是消除核武器的最彻底的捷径，因为此时正在谈判销毁发射器问题而弹头仍留在各国的武库之中。因此，严格来说，人类尚未处理核裁军的主体问题，国际社会有理由对此表示关切。停止生产浓缩铀和钚势必导致缩小生产核武器关键部件的实际工业基础。我们认为目前有解决该问题的客观有利条件：美国基本上已经停止生产武器用钚；1989年苏联停止生产武器级铀，已关闭了三个生产武器用铀的反应堆，已经制定了一个方案，到2000年关闭这种类型的所有钚反应堆。为此我们可理所当然地在这里提出，在这样的条件下裁军谈判会议可以开始审议在监督下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物质的问题——当然在有效控制之下。

如果我们要举出国际社会在数十年内不能完成它本身所制定的任务，那么核试验问题将是最突出的例子。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未能采取行动，这损害了其威信。同时，很显然禁止试验不仅是制止核军备竞赛的措施也是不扩散核武器的重要办法。我们认为就该问题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的时机确已成熟，它可开始着手工作而且越早越好。捷克斯洛伐克关于该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建议可能提供了一个基础。这已得到大家的承认。实际上讨论涉及的都是措辞问题。是不是可以停止这一争议，同意接受现有的职权范围草案？这是经过长期争论之后以妥协精神提出的一个建议。在这方面，我要再次重申我国代表团支持尊敬的堂勃光朗大使为此所作的努力。我们

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就禁试问题开始工作必然是逐步性质的，这与苏联和美国同意的逐步的处理办法是核试验谈判的基础并没有矛盾，当然分阶段处理办法肯定会采取不同的具体形式。

苏美1974年和1976年极限条约议定书已经签署，这意味着苏美双边会谈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根据现有协定，我们支持为考虑进一步限制核试验的次数和当量的目的继续进行这些双边谈判。苏联建议今年9月恢复谈判，我们期待美方作出积极答复。

下面简单谈谈在外层空间禁止军备竞赛的问题。外空技术是迅速发展的领域之一。它与安全和稳定直接有关。虽然我们不知道正在研究外空技术，但我们不知道10年或15年后我们将要对付什么样的外空技术，尤其是有军事意义的外空技术。多年来，裁军谈判会议在外空问题上一直在原地兜圈子，令人沮丧。与本会议许多其他成员一样，苏联提出了一系列防止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的彻底措施——旨在防止发展和部署任何外空武器或具体类型的武器，如反卫星武器的措施，这些措施都是禁止性质的。然而，经验表明近期内这种重大措施不可能成为具体谈判的主题。结果，越来越多的代表团倾向于开始就外空建立信任措施进行谈判。我们认为这是对的。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谈判而开始谈判，不是为了能报告说我们正就外空问题进行谈判，而是为了迈开第一步，为信任各国的外空活动奠定基础——就外空的安全和稳定进行建设性的多边工作积累经验。无论苏美双边谈判多么重要，多边努力还是绝对需要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参与外空活动。因此，我们建议“开放的外空”的概念应该成为裁军谈判会议审议的议题。我们认为与实现“开放的外空”的概念有关的最重要措施如下：(a) 加强1975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b) 制定“路规”或“动为准则”；(c) 为国际社会利益利用以外空为基地的监测装置；(d) 建立一个国际外空检查站。法国提出的建立外空图象处理中心的提案值得积极响应。这些措施不会威胁到任何国家的安全，我们敦请所有国家详细研究“开放的外空”的概念所包含的积极思想。

最后，简单谈谈化学武器问题。人们普遍承认在目前的情况下载军谈判工作中最可望取得成就的工作是就该问题起草一项公约。这方面，苏美关于化学武器的协定受到极大重视。苏联和美国将开始执行协定的主要规定而不等待公约的缔结。我们认为在这项双边协定内，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承诺特别重要。实际上，它是未来多边公约的基石。我们认为苏联和美国同意在公约缔结之前承担这种义务，这充分说明双边协定缔约国愿意为尽早缔结公约作出努力。对苏联来说，这还意味着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生产化学武器（这是1987年作出的决定）将正式成为国际条约，从而明确而最终地解决了苏联是否会投入新的资源，生产化学武器的问题。

双边协定规定苏联和美国将在多边谈判中提出一项建议，在公约生效后的第8年底举行一次特别会议，通过多数票决定参加公约是否就足以彻底销毁化学武器。联合声明载有这一提案的细节。在这方面，我不仅代表我国代表团，而且也代表美国代表团提请尊敬的各国代表注意工作文件CD/CW/WP……序号，我想序号尚未定出——你们收到的是预发件。我们两国代表团计划在适当的时候和情况下对其加以更仔细的研究，这一步骤是根据6月1日在华盛顿签署的双边协定作出的。

现在回到我自己的发言，我要强调我们有一个妥协提案，它考虑了美国提案，它被称为“2%”的提案和苏联和若干谈判参加者对美国这一初步提案提出的批评。妥协提案考虑了下面两个因素：需要评估各国参加公约的情况，从公约的有效性看这点十分重要；和避免刺激各国要求获得化学武器的重要性。此外，该提案鼓励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成为公约的原始缔约国。

最后，对批评该提案的国家我们表示应有的尊重，但我要说，我绝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即苏美企图支配或意欲将两国的决定强加给谈判参加国。双边协定明确阐明双方同意在裁军谈判会议介绍该提案，我要强调是提案。这当然是每一个参加谈判的国家的合法权利。我们方面对于这一联合处理办法感到满意，并将在未来工作进程中维护其优点。同时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努力，解决未来公约的普遍性问题。

在这方面，我愿提到北约外长在特恩贝里通过的声明，尤其是其中提到北约集团成员国打算首批签署未来公约的那段话。我们欢迎这一声明。当然，我们也欢迎瑞典和芬兰甚至更深远的声明，他们愿成为原始参加国。裁军谈判会议夏季会议期间，化学武器多边谈判将获得新动力，对此我们抱很大希望，但是不幸的是，近年来一直缺乏这种动力。严格来说要做的事不多，但必须在余下时间内奠定牢固的基础，以解决所有未决问题，首先解决有关定义、质疑视察、特别视察、对化学武器受害者的援助等问题。

苏联代表团今天的发言谈了对裁军问题的若干重要方面和裁军谈判会议在解决问题方面能发挥的作用的看法。我认为我们今天工作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本会议已开始重视自己。我们开始集体注重我们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的地位。我们计划在不远的将来谈谈该主题和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题。

巴雅特先生（蒙古）：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有效而干练地主持了裁军谈判会议6月份的工作。我也要感谢巴基斯坦艾哈迈德·卡迈勒大使，他卓越地主持了裁军谈判会议4月份的工作。这是我在离开蒙古代表团大使职务之前最后一次在裁军谈判会议发言。请允许我以个人角度讲几句话。

我在日内瓦任职的年月里，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通过集体的努力正在形成一个国际安全的模式。国际关系民主化正在成型。这些变革是深刻的，并为裁军谈判开辟新的更光明的前景。苏联和美国缔结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协定。核查问题一直是裁军道路上的绊脚石，但只要有政治意愿，有妥协和合作的精神，事实证明该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我希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最近就销毁和不生产化学武器和采取措施推动缔结禁止化学武器多边公约达成的协议将促进我们的共同努力，实现全球公约尽早缔结。我还相信未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将是一个难得的文件，它对一系列传统上极其难以解决的问题会拿出新的处理办法。我深信就核查和执行

精心制订的程序将成为未来多边裁军协定的楷模。

我高兴地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决定撤回它在批准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时所作的保留。我们认为这一步骤是加强议定书规定的禁止制度的重要措施。

蒙古政府欢迎苏联和美国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联合声明。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可望在今年底签署，它应该成为近几年裁军谈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该条约将削减两个大国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几乎一半，它将为促进国际和平和增加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我将在发生巨变的时代返回我国。蒙古改革和革新的进程已经加速。毫无疑问，今年上半年的政治发展将对我国的未来产生深刻影响。总之，蒙古正经历的深刻变革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真正的民主。政府正将其政策的主旨转向人和社会方面的发展。改革涉及到我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外交政策。蒙古政府一贯奉行在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尊重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和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政策，并一贯忠于这些原则。不结盟是蒙古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政府将继续奉行蒙古不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将不让针对第三国的外国部队或武装力量驻扎在蒙古的领土上；继续促进和加强与邻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相互信任。蒙古将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寻求通过政治途径确保其安全。我国将继续积极参加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促进全球问题，如裁军、环境保护、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等问题的解决。

我在日内瓦任职已经5年多了。对我本人来讲这5年既令我振奋又使我获益不浅。我将永远珍视我个人与我同僚的友谊、官方接触和合作的美好记忆。我曾尽力从他们身上得到教益。我一贯钦佩和尊敬我的同僚对裁军问题的渊博知识和外交谈判才干。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我与裁军谈判会议打交道十多年。我赞成这样的看法，即裁军谈判会议继承了过去的内容，如其议程、决策过程和组织工作等。显然裁军谈判会议应该采取步骤，使之适应当前的现实。这是一个需要进行认真谈判的

进程，只能逐步实现。我坚信本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讲坛，我肯定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的集体努力和政治智慧能找出改进和有效发挥裁军谈判会议作用这一重要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鉴于国际环境的改善，我有充分的理由乐观并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将就许多优先问题，特别是，全面核禁试和核裁军，进行建设性和卓有成效的谈判。

最后，我要真诚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科马蒂纳先生和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贝拉萨特吉大使，在我任职期间他们一直给我支持和合作，特别是在我有幸于去年7月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期间和我在1986年和1989年主持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期间。我还要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能干和效率高的工作人员和所有在本会议室看不见的人，他们的献身精神和高度的专业才干使裁军谈判会议得以顺利进行。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大家告别。我祝愿你们和裁军谈判会议取得成功。

主席：我感谢蒙古巴雅特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我本人说的友好的话。我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和我本人向巴雅特大使和夫人转达最良好的祝愿，祝他们在本国幸福和事业上取得成功。众所周知巴雅特大使有效、干练和忠实地为他的国家服务，他还是一位语言天才。他在本会议的活动作为会议主席对我们的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还两次担任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巴雅特大使在两任主席期间表现出了他一贯具有的才干，现在他作为裁军谈判会议代表使团的副团长离任。我们祝愿巴雅特大使万事吉利。

今天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人了。其他代表团有人希望发言么？如果没有，我建议我们讨论下周会议时间表。秘书处今天散发了该时间表。按惯例这是与附属机构主席协商后拟定的。从时间表上可以看出，关于改进并更有效发挥裁军谈判会议作用的问题的不限名额成员协商会议将于7月3日星期二，而不是7月5日星期四举行。7月5日将安排给关于议程项目5的特设委员会。与以往一样，时间表是提示

我认为卡迈勒大使提出供我们审议的协商方案未遭任何反对而被接受，这是趋向一致的积极迹象。因此，在第一次工作会议，就增加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的各种立场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交换了意见。会上出现了令人感兴趣的建议，可以作为基础，探讨新的模式或方式，从而使我们能够解决大家所希望的增加成员的问题。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我非常高兴地将本会议主席的任务转交给我的下一任，经验丰富的博古米乌·苏伊卡大使。我祝愿他在履行职责中取得成功。我要感谢秘书处为支持主席正在进行的重要工作。我要特别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科马蒂纳大使和贝拉萨特杰大使。

今天没有其他事项了，因此我宣布全体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3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举行。

上午 11 时 30 分散会。

×× ×× ×× ×× ××